

參與式博物館與分散式文物管理*

The Participatory Museum and Distributed Curatorial Expertise

蘇岱克維斯特(Thomas Söderqvist)/著

王聖智/譯

本期刊中針對大學收藏品與博物館的一系列評論文章已明確點出若干在討論科學、科技與醫學史時被忽略之問題。德·黑森(Anke te Heesen；按：現為德國洪堡大學科學史教授)指出一個常被遺忘的事實，亦即大學收藏品對大學進行研究與教學的眾多領域而言乃不可或缺之一部分(te Heesen 2008)；收藏品成為大學主要功能之一的這種積極角色便因此成為大學博物館在研擬館藏添置或展覽事項時必須考量的一項重要參數。季蕭(Christian Sichau；按：德國物理學家與科學史學家)則對大學收藏品傳統管理工作快速惡化之政治、知識與經濟地位提出警告(Sichau 2009)；此快速惡化之地位對大學博物館而言乃一項嚴重的長期威脅，因為當前向超級展覽(blockbuster exhibition)與節慶/活動文化(event culture)靠攏之趨勢——此趨勢甚至已可見於科學、科技與醫學博物館——削弱了大學博物館作為保存文化遺產與添置文物之特定空間角色。最後，施奈爾克(Thomas Schnalke；按：德國醫學史學家)在本期之文章中刻意忽略收藏品、文物管理與館藏添置等問題，進而採取另一種發人深省之方式，討論大學博物館展覽在科學溝通中對大學內部以及廣大群眾的潛在巨大作用。

上述三位作者均在科學、科技與醫學博物館領域具有豐富的相關經驗。其被收錄於本期期刊之文章共同為未來討論博物館收藏品，特別是大學博物館收藏品之角色提供一個極佳平台。本文之討論將聚焦於季蕭所提出，而黑森與施奈爾克未甚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亦即科學、科技與醫學博物館應如何處理新添置的館藏。這類博物館應如何管理這些日益增加的、來自辦公室與實驗室的科學、科技與醫學文物、文件，以及影像？它們是否應該迎頭趕上這波永遠收藏不盡的浪潮？它們是否應該盡可能地收藏所有物品，或應該僅限於樣品(若如此，選取樣品之依據又為何)？它們是否應該具有全球視野，或應該專注於當地大學所生產與/或使用之物件(若如此，在這個知識與文物產出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在地生產」與「在地使用」之真正意義又為何)？或者，博物館是否應該讓外展人員依據活動邏輯(event logic)來決定要收藏什麼，例如當某個顯微鏡展的檔期被排定後，電子顯微鏡就會被列為收藏品，而一旦這些人員計畫一個有關肥胖症的展覽時，電子

* 原刊於《藝外 ARTITUDE》，2014年3月號，第54期，頁70-77。

顯微鏡就被排除在收藏品之外？

季蕭主張嚴格限制館藏的添置。他主張一種趨近於零(next-to-zero)的收藏政策，以反對科學史學者韓雀爾(Klaus Hentschel)於 2008 年 3 月號的《物理學期刊》(Physik Journal)中以「請勿丟棄！」(Bitte nicht wegwerfen!)為題之訴求。韓雀爾在該訴求中舉出一個令人寒心的例子，亦即某些德國早期固態物理學之重要歷史文物在不經意之情況下被損毀。韓雀爾呼籲物理學家應更加關注他們留下的物件，並要求他們在丟棄任何舊資料前應先與檔案館或博物館聯繫。

季蕭以韓雀爾的訴求為出發點，採取一種謹慎的悲觀立場。由於博物館的空間相當有限，管理者的日常例行工作經常是拒絕而非接受新的物件。此外，當代物件並未重要到值得舉辦展覽，它們既無法提供我們關於過往歷史的線索，亦無法告訴我們目前科學、科技與醫學的最新進展。最後，公開推廣往往超越了保存這些文物之需求，而且當今的展覽更傾向依賴引人注目的多媒體而非物件本身。因此，儘管收藏物件可能具有學術上的理由，季蕭依然於結論說道：「作為一位管理者，我必須對此說『不』。」

若我贊同季蕭的論點，便不會耗費這麼多心力試圖呈現當代科學、科技與醫學的物質文化(material culture)。作為哥本哈根大學醫學博物館館長，我選擇將此博物館之研究、文物添置，以及推廣活動明確聚焦於二十世紀晚期至當代的醫學與醫療科技。因此，我得出與季蕭截然不同的結論。

所有從事博物館相關工作的人員均熟悉季蕭面臨的問題，而我亦相當能夠理解為何他會表達出這種失敗主義者的觀點。我也認為當代科學儀器與文物之添置與維護對博物館(尤其是大學博物館)而言是件相當艱困的任務。目前的文化與政治氣氛使大學博物館陷於兩種主導邏輯之間的不安地位。一方面，博物館的邏輯偏好創造引人注目的公開展示與活動；另一方面，大學系所的主導邏輯則傾向盡可能在排名高的期刊發表經常被引用的學術文章。

當今的大學博物館便陷於這兩種根深蒂固的邏輯之間。這種模稜兩可之地位是有問題的。因為對科學儀器、技術設備，以及醫療文物之保存與管理並不必然能夠創造受大眾歡迎的超級特展，或是能夠使文章數量在具有高影響力的期刊中穩定成長。添置與管理這些物質性的文物、圖像與文件收藏品極容易成為一種均非(neither-nor)的作為，亦即這是一個平淡無奇的、不顯眼的活動，而導致在排名低的期刊中無足輕重的文章發表。

與季蕭相反，我並不悲觀。因為我認為這些問題在智識、邏輯與政治等方面形成有趣的挑戰(Söderqvist and Bencard 2008; Söderqvist, Bencard and Mordhorst 2009)。我所見的是機會而非阻礙。因此，我認為，當我們有機會收藏當代實驗室或儲藏室裡可見的、物質的，以及文本的物件時，態度應當為積極且歡迎的。我們甚至應該秉持韓雀爾的精神，主動促成這些物件的添置。換言之，我們不僅不應固步

自封，更應打開這道閘門。一個樂觀的「積極歡迎」政策遠較悲觀的「敬謝不敏」政策更恰當、更明智。

上述論點乃基於我在哥本哈根大學醫學博物館的整合研究與管理計畫「展示中的生物醫學」(Biomedicine on Display)(<http://www.corporeality.net/museion>)中汲取的經驗。此計畫始於 2005 年，目的乃為二十世紀晚期至當代生物醫學的視覺與物質文化之添置與公開推廣建立研究基礎—科學、科技與醫學博物館迄今仍僅相當零星地呈現這段時期的生物醫學史。

過去四年來，我們進行了眾多關於二十世紀晚期至當代的生物醫學各層面之研究計畫。與此同時，我們亦舉辦一系列或多或少與當代科學有明顯關聯的展覽，包括 2007 年至 2008 年間的「老托邦」(Oldetopia)(主題為老化研究與對老化的文化性理解)，以及 2009 年春季的「為科學而設計」(Design4Science)(主題為分子物件與文化物件設計)和「受矚目者與招搖圖像」(Eye Catchers and Swagger Images)(主題為科學海報暨藝術物件)。2009 年 6 月，我們舉辦了「裂縫與切片：生物醫學時代的碎片」(Split+Slice: Fragments from the Age of Biomedicine)展覽，由藝術家富雷明(Martha Fleming)及其他四位參與此研究計畫的博士後研究員共同策展。此展覽透過物質文化、物件，以及研究人員和臨床醫師使用的儀器設備，展現出當代生物醫學的複雜性。最後，我們在 2009 年 9 月舉辦了「原始物質：蛋白質研究史的瑰寶」(Primary Substances: Treasures from the History of Protein Research)展覽，以「瑰寶」這個模糊概念為主軸，展示眾多二十世紀蛋白質研究的代表性文物。

這些研究計畫與展覽促成了對哥本哈根地區各實驗室與醫院晚近文物的大量收藏。部分文物乃為因應展覽需求而被選取，其他則是得自大學實驗室、醫療院所，以及製藥與醫療設備公司的主動捐贈，另外還有一些則是我們主動募集的成果。我們的儲藏空間相當有限，亦缺乏足夠的專業人員來妥善管理所有文物與事項，登錄進度總是落後。然而，我們極少對文物的添置說「不」。在某些具體實例中，我們確實曾不安地拒絕添置某些文物，但這並非我們一貫的收藏政策。為什麼？

基本上，我認為「積極歡迎」政策開啟了博物館與科學、科技與醫學實踐者之間一連串成果豐碩的互動。的確，此項政策可望改變科學、科技與醫學博物館界定其與大學其他單位之間關係的方式。此項政策公開邀請每一位附屬於大學的研究者、技術人員與學生擔任自身物件的兼任管理者，而不再將大學博物館視為一個封閉的、由專業人員管理的精美物件寶庫。

博物館永遠無法雇用足夠的專業管理人員來描述、登錄與評估在大學實驗室與儲藏室裡的每一件文物與圖像。就此方面而言，季蕭是對的。然而，透過科學、科技與醫學專業同僚之協助，我們便可創造一種分散式的文物管理知識與技術(distributed curatorial expertise)。這在企管領域稱為「群眾外包」(crowdsourcing)。霍威(Jeff Howe)於 2006 年《連線》雜誌(Wired)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此名詞。維基

百科將之定義為一種「分散式的問題解決與生產模型」：

以公開徵求解決方案之方式，向未知群體傳達問題。使用者(亦即群眾)通常會組成線上社群並提交解決方案。群眾亦會檢視所有建議以找出最佳解決方案。這些最佳解決方案最後將為拋出問題的一方—發包者(crowdsourcer)—所有，而提出最佳解決方案的個人有時會被獎勵[...]透過群眾外包，我們可從業餘人士或志願者利用他們空餘時間的回應找到解決方案，亦可從各領域專家或沒沒無聞到初具規模的各種小型企業之建議獲得解決方案。

群眾外包僅為近年來出現的眾多社會參與式知識生產技術之一，這些技術與「web 2.0」此一普遍概念相關。相對於代表網路資訊從提供者與生產者朝讀者/使用者單向流動的「web 1.0」，「web 2.0」代表的是一種促使被動網路使用者轉變為主動生產者的知識與資訊結構。維基百科在質與量方面的成功即是參與式網路的最佳例證。類似的計畫如 Foldit (<http://fold.it>)與 Galaxy Zoo (<http://www.galaxyzoo.org>)亦吸引成千上萬的網路使用者註冊，主動地分別參與蛋白質化學與天文學的知識生產，並取得豐碩成果。

博物館學家賽門(Nina Simon)則以「web 2.0」概念為基礎，創造出「museum 2.0」概念(<http://museumtwo.blogspot.com>)。其主要目的並非利用社會性網路媒體作為推廣博物館之工具，而是從「web 2.0」的角度重新思考實體博物館，亦即以「web 2.0」作為概念工具，將參與式博物館類比為參與式網路。這項雄心任務之目的在於從使用者參與、使用者創意，以及分散式知識等角度將博物館所有活動重新概念化，包括研究、添置、管理、展覽及其他各種推廣活動。就科學、科技與醫學文物的添置方面而言，任何一個任職於大學或其他研究機構，且日常工作即常與這些可能成為博物館文物接觸的人，均為潛在管理者。博物館之目標便為轉化這些潛在管理者，使他們主動參與這些收藏品的添置與管理(亦即「群眾添置」crowd acquisitioning)。

分散、管理與群眾添置等社會性技術本身並無法解決博物館儲藏空間不足的問題。然而，參與式博物館的意涵之一便是其收藏品實體並不必然得擺置在博物館的核心建築裡。若收藏品的管理與管理者能夠被分散，那麼收藏品亦然。分散博物館收藏品並非意指一座博物館以及唯有專業管理者才有權限進入的周邊儲藏庫；我們應將此想法理解為具有不同尺寸與豐富性的在地收藏網絡，各網絡由在地的兼任管理者管理，這些管理者決定文物的添置、管理與儲藏。大多數大學院校的大多數系所均有各自的小型收藏，這些所謂的收藏有時僅是在一個小型櫥窗中放置少許堪供紀念與懷舊的物件。相對於分散式博物館收藏，中央博物館的治理角色主要便是就博物館在收藏品添置與管理上的「最佳實踐」提供指導方針。

分散式博物館收藏網絡的推行不僅可望解決儲藏空間不足所導致的某些問題，亦可能喚起實踐者暨管理者的歷史自覺與責任感。與其雇用更多的專業人員來收集、管理文物，以及將文物登錄於中央博物館的儲藏庫，不如把稀少的資源用於訓練這些實踐者暨管理者成為幫助大學博物館與大學其他單位建立關係的守門人。與其獨力管理這些文物，專業博物館管理者更應該做的是為這個分散式管理者網絡提供一套文物管理與保存的指導方針。此外，他們應該散佈相關協定以供分散式管理者在一個維基式(wiki-based)的中央資料庫裡註冊。更重要的是，他們應該投入更多心力與時間去激勵實踐者針對為何這些科學、科技與醫學文物值得保存，以及這些文物在文化認同的建立上扮演何種角色等問題進行討論。簡言之，他們的任務即為建立一種分散式的文物管理經驗。

上述所言大部分均非新觀念。許多地方性與區域性博物館早在「museum 2.0」概念被創造之前便已沿用這些觀念內涵。許多科學、科技與醫學博物館均由建立小型在地收藏的熱情實踐者所發起的參與式收藏計畫發展而來，其中有些仍由大學系所或科學社群照料管理。哥本哈根大學醫學博物館即為其中一例。如今，該博物館已躋身歐洲最龐大、最豐富，且最多樣化的醫學文物收藏機構之一，很難想像它是由哥本哈根的一群醫師於 1907 年丹麥醫學協會(Danish Medical Association)五十週年大會中私下發起的收藏計畫發展而來。起初此計畫僅被設想為一個當代醫療設備收藏品的特展，以紀念自 1857 年該協會創立以來的醫學進展。而後，此收藏展轉變為常設型態，博物館的規模亦因文物捐贈者延續三代不滅的熱情而日益擴大。

如今，這種參與式添置實踐基本上已不復存在。科學、科技與醫學博物館在整個二十世紀當中逐漸發展的專業化過程(professionalization)已使這種實踐看似業餘和過時。然而，我認為現在應是時候重新思考使科學、科技與醫學實踐者在文物添置與管理方面扮演更積極角色所能帶來的好處。即便博物館知識生產的具體特徵(物質性文物)仍為一項必須克服的額外挑戰(我們無法僅於虛擬空間中經營公眾博物館)，群智科學(citizen-science)計畫如 fold.it 和 Galaxy Zoo 仍為如何從原則上實現此目標之極佳典範。哥本哈根大學醫學博物館直至最近才開始嘗試採取各種不同方式來動員實踐者添置與保存晚近至當代的科學、科技與醫學文物。我們曾經並持續犯下許多錯誤，但經驗告訴我們，這是一條值得堅持走下去的道路——這亦為一條與季蕭悲觀的「敬謝不敏」態度相反的道路。

另一項能夠克服博物館儲藏空間不足與資源稀少等問題之途徑，即為強化館際合作。只要博物館認為自己僅為區域性或國家層次的行為者，卻須承擔全面性的任務，季蕭的悲觀看法便相當容易理解；即使如德意志博物館、倫敦科學博物館，或華盛頓特區的史密森尼博物館等龐大機構，亦缺乏足夠的人員、時間與經費去進行一項涵蓋所有當代科學、科技與醫學文物的

系統性(或系統性選擇的)添置計畫。

除了少數個人層次的臨時合作計畫，各座科學、科技與醫學博物館之間並無緊密合作之傳統。它們視彼此為國際上的競爭者而非合作對象，並認為自己原則上有責任保存所有的科學、科技與醫學文物。然而，由於單一博物館不可能保存所有的科學、科技與醫學文物(除非我們發展出如前述極為激進的分散式收藏程序)，此原則的不可行性便導致類似季蕭在其文章中所表達的失敗主義(defeatism)。

目前若干歐洲主要的科學、科技與醫學博物館正試圖建立一項泛歐洲的國際合作計畫，目的在於實現館藏數位化，並使公眾能夠透過全球資訊網查找參與計畫之機構的館藏文物圖像。然而，這些博物館至今仍未試圖建立一個文物添置與管理合作計畫，因為它們對於科學、科技與醫學文物應如何分類仍無法達成共識，例如生物醫學實驗室設備屬於一類，固態物理學屬於另一類，各種成像技術則屬於第三類等等。

誠然，全歐洲有數以百計地方性與區域性的科學、科技與醫學文物收藏館因歷史的偶然而發展出相當狹隘的收藏範圍。然而，這些收藏在其本身界定之範圍內通常已頗為全面：例如英國里茲沙克雷博物館(Thackray Museum)的外科手術器械與其他醫療器械目錄之壯觀收藏，以及倫敦杭特利安博物館(Hunterian Museum)的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初期病理學標本收藏。然而，就我所知，沒有任何一座博物館會刻意區分添置與管理任務——尤其是當涉及到二十世紀晚期至當代的科學、科技與醫學文物。

當然，這並非一項簡易的任務。沒有任何一座博物館，尤其是國立博物館，會輕易放棄對全面性(comprehensiveness)的追求。沒有任何一座博物館會自行放棄添置某些地區的文物的，而放任其國家層次或區域層次之競爭者接管那些地區的文物的。即使它們今日仍缺乏資源，即使它們在日常工作上採取限制性的「敬謝不敏」政策，它們依然懷抱追求全面性的雄心。

因此，所有博物館均極少將某些範圍的潛在文物收藏權利無條件讓渡給其他國立博物館或區域性博物館。倫敦科學博物館有可能放棄收藏奈米科技與奈米醫學文物，而使德意志博物館輕易地接管這些迅速發展領域之文物嗎？即使我們發覺另一座歐洲境內的博物館或許擁有更多資源與技術人員去添置與管理當代蛋白質研究文物，哥本哈根大學醫學博物館有可能因此放棄這方面的努力嗎？

這只是在建立歐洲當代科學、科技與醫學文物共同添置政策過程中所面臨眾多問題之九牛一毛。其他問題包括相關行政工作，以及如何針對這些大量文物開發出能夠不斷更新的清單(以醫療設備科技領域為例，每三十八分鐘便有一項專利被授予，其中許多是與大學的醫學或工程系所合作開發)。

總而言之，季蕭的爭議性評論產生某種正面效果。其悲觀的「敬謝不敏」立場迫使我們構思某種建設性方法去實現那些乍看之下辦不到的事。參與式博物館概念與分散式文物管理乃針對失敗主義式與限制性添置政策之實際替代方案。大學博物館應以大無畏精神進行科學、科技與醫學文物的保存與管理。因此，在原則上，讓我們積極地收藏一切吧！

致謝

感謝霍姆伯格(Gustav Holmberg)(瑞典隆德大學)對本稿後期版本所提出的寶貴評論意見。

參考文獻

1. te Heesen, Anke, 2008. In medias res. Zur Bedeutung von Universitätssammlungen. *NTM.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e der Wissenschaften, Technik und Medizin*, 16, 485–490.
2. Hentschel, Klaus, 2008. Bitte nicht wegwerfen! Allzu oft werden Quellen der Physikgeschichte achtlos entsorgt, statt sie zu sichern. *Physik Journal*, 3, 3.
3. Howe, Jeff, 2006. The Rise of Crowdsourcing. *Wired*, 14, URL: <http://www.wired.com/wired/archive/14.06/crowds.html> [accessed 1 October 2009].
4. Sichau, Christian, 2009. Einstein, interaktiv und zum Anfassen. Oder: die drohende Auflösung des Museums? *NTM.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e der Wissenschaften, Technik und Medizin*, 17, 85–92.
5. Söderqvist, Thomas/Bencard, Adam, 2008. Making Sense or Sensing the Made? Research into Presence Production in Museums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In: Görel Cavalli-Björkman and Svante Lindqvist (Eds), *Research and Museums*. Stockholm: Nationalmuseum, 161–173.
6. Söderqvist, Thomas/Bencard, Adam/Mordhorst, Camilla, 2009. Between Meaning Culture and Presence Effects. Contemporary Biomedical Objects as a Challenge to Museums.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40, 431–438.